

doi:10.3969/j.issn.1672-4348.2014.05.002

论林纾的文学修为

吴毓鸣

(福建工程学院人文学院, 福建福州 350118)

摘要: 林纾是闽籍作家, 不识英文, 却引介“西学”, 而且用的是文言, 成为译界奇观。“白话”登台亮相, 林纾却对“文言”情有独钟, 故有“文白之辩”, 因此被文学史疏远。所幸“文言”与“西学”在林纾笔下情投意合, 称道者众, 为“小说”扶正立下汗马功劳, 又与新文学启蒙不期而遇, 其文学修为举世瞩目。

关键词: 林纾; 遗老; 维新; 启蒙话语; 文学修为

中图分类号: I206.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4348(2014)05-0415-05

On Lin Shu's literary accomplishments

Wu Yuming

(School of Humanities, Fuj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Fuzhou 350118, China)

Abstract: Lin Shu is a Fujian writer, who introduced “Western learning” in classical Chinese despite that he did not learn English. His achievements has been regarded as a wonder of the translation arena. At the emergence of “Vernacular” Chinese (popular Chinese), Lin Shu adhered to his life-long love for the classical Chinese, which caused the debate on the two forms of Chinese and made him alienated from the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However, the harmonious marriage between the classical Chinese and Western learning in Lin Shu's works was widely praised, which contributed significantly to the acknowledgement of “novels” in modern China and encountered unexpectedly a new literary enlightenment.

Keywords: Lin Shu; survival; restoration; enlightenment discourse; literary accomplishment

1917年林纾同陈独秀、胡适、李大钊、刘半农、钱玄同诸君轮番过招, 辩“文白”之短长, 因而落下“遗老”、“守旧”的骂名。林纾不以为然我行我素, 说文言讲西洋故事, 形神兼备娓娓动听。在林纾笔下, “文言”并非垂死挣扎的小丑, 而是风韵犹存的少妇。林纾不是刻意守旧不是故意逆新, 执文言译西学, 因为古文功底深厚得心应手可以化腐朽为神奇。再说, 语言本身没有身份。说一口地道英文的辜鸿铭梳着小辮走进北京大学教室, 学生哄堂大笑。辜老夫子平静地说: “我头上的辮子是有形的, 你们心中的辮子却是无形的。”

虽为“遗老”, 学生肃然起敬。再说, 唐宋古文运动八大家弃掷华丽奢靡之骈文, 追求简质质朴之散风, 内容言之有物, 语言行云流水, 哪怕在文言文消亡的今天, 唐宋八大家的文章依然是百读不厌的佳作。评说林纾, 听到他说“文言”, 即指手画脚圈定“遗老”是很不负责任的文学批评。

林纾的文学修为重在译介“西学”, 如果知其然, 不知其所以然, 说子丑寅卯就觉得很滑稽。所以了解林纾为什么译介“西学”, 他的原创诗文不

可旁绕。

林纾视“变法”为救亡图存的途径。中日“甲午战争”以中国失败而告终,林纾怒清政府奴颜婢膝不顾国耻,仿唐朝诗人白居易的讽喻诗,以乐府为体裁,唱出“维新”之歌,结集《闽中新乐府》。《知名士》、《破蓝衫》即为其中名篇。

林纾在《知名士》中,批评“外间边事烂如泥,窗下经生犹作梦”的腐生,从责任道义的层面,讥讽袖手旁观国家命运的知识分子。当时学界“引西救儒”呼声很高,西风东渐已成风气。一些有识之士思取彼之长补己之短,进行社会改良,故有洋务运动,但阻力重重。“偶闻洋务斥狂佻,此舌不容后辈饶”揭示了维新的重重阻隔,林纾对“方今欧洲吞亚洲,噤口无人谈国仇”的现状痛彻心腑。如果胸有学问,而不以天下为己任,博古而通今,又有何用?结尾敲响“名士名士将穷途”的警钟,振聋发聩。

《破蓝衫》也是呼吁变法维新之作。“蓝衫”是明清生员(俗称秀才)所穿服装,是一种身份的象征。但再贵重的衣服,“破”即无足观。就题而论,是对功名,也是对科举制度的否定。“八股”教育明清倍受诟骂,顾炎武批评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坑儒,“废天下之生员而官府之政清”(《生员论》)。徐大椿批评读书人热衷“八股”,辜负光阴,白白昏过一世。林纾“叹腐”,力陈八股文之弊,“腐字腐句呼清真”,道出八股文的荒诞不经,腐朽的文字,不可能“清水出芙蓉”,也做不到“惊天地,泣鬼神”。林纾针贬“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腐生,希望改变“堂堂中国士如林,犬马宁无报国心”的可悲现状。学校成为“书呆子”的摇篮是教育的悲哀,必须改变教育模式,培养知识分子的国家责任感,时代使命感,社会正义感。诗以“救时良策在通变,岂抱文章长守株”作结,可以说林纾是“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

当然,林纾的诗文并非篇篇鼎新革旧之作,但为革命振臂高呼的诗文倒也随手撷来。1911年武昌起义,各省纷纷响应,隆裕太后答应宣统退位。此时林纾寓居天津西开,“见津门大街各报馆,高张大革命白帜,书革命成功万岁。见者皆欢呼”,奋笔写下《归途感赋》:

此局明明肇孝欽,卅年府怨士民深。

纷奢有过秦人暴,屠胁无难汉陆沉。
纵未改元署光宅,居然漏网免河阴。
今朝父老欢呼竞,鼎革仍原上帝心。

光绪亲政,慈禧垂帘,欺内媚外,国不泰民不安。光绪有意维新,无奈手无实权,力不能逮,变法以失败告终。“纷奢有过秦人暴,屠胁无难汉陆沉”,林纾斥慈禧之骄奢之残暴,比秦有过之而无不及。国势飘摇,宣统称帝,无能力挽狂澜,退位乃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林纾反对暴力,主张立宪。宣统退位,社会改良,这是他所期望的。《归途感赋》诗前小序“见者皆欢呼”,诗中“今朝父老欢呼竞,鼎革仍原上帝心”呼应,时代画面在诗中漫卷,诗人激情在诗中澎湃。哪里看得到“遗老”的影子?

1915年,袁世凯无视民情民意,一意孤行,穿龙袍登宝座,签定“二十一条”,拱手出让国家主权,博取日本政要的欢心,举国上下嘘声一片。袁世凯不思己过,以“高等顾问”、“硕学通儒”招揽知名学人造势。林纾不满于袁世凯的所作所为,拒签《劝进表》。且写“畏天”二字,张贴在宣南大门上,毫不掩饰不屑一顾的眼光。林纾的政治态度催生了声援革命的文学篇章。在小说《黄建人》中林纾塑造了一个出生入死的女革命者形象,其革命情怀一览无余。

建人出场,作者没有象才子佳人小说那样挥毫泼墨渲染她的美貌、才识,以“美秀而通文”一语带过,语言精炼至极。但刻划女子的思想性格,作者不吝笔墨。痴“每会文,辄倾其曹”,虽然表面写父亲,实际写建人的成长环境。其父闲情逸致、慷慨大方、广交贤良,虽然“不审其女所抱”,但并没有阻挠女儿投身革命。建人之豪气有其父之风范,建人有见识有胆魄亦得益于家中高朋满座胜友如云。寥寥数语,交代了建人的家庭文化背景。建人身为女子,巾帼不让须眉。面对“天下汹汹,而政府耳若聩而目若瞑也”的形势,此女子拍案而起:“建人今日殆与满清不两立矣!”一个大政府,一个小女子,形成强烈反差,极尽政府之丑态,极尽建人之伟岸,极抒作者之愤慨。建人言必行,行必果。革命者粤中起事,建人将炸弹、手枪装在棺木里,伪装丧夫,穿白扶柩痛哭,运入城中。身临险境毫无惧色,“掷二弹,炸数人,竟

以智计自脱”。有勇有谋的女豪杰形象跃然纸上。更为可贵的是建人投身革命,为国为民,而不为名为利,“则宜乎开会而号召徒侣者,其中终不见有建人者”。追求道义,淡泊名利,功成身退,可以说是林纾对革命者的理想建构。

宣统退位,林纾欢呼;袁世凯称帝,林纾不齿;女子革命,林纾赞美,维新思想一以贯之。当然,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不可能一马平川,林纾的诗文偶有思想摇摆,实属正常。现代最坚定的革命者鲁迅“呐喊”过,也“彷徨”过,又怎么能苛求近代林纾毫无犹疑。

有爱国思想革命情怀维新精神,林纾走进“引西救儒”的队伍并非偶然。

二

林纾从1897年开始与人合作第一部译作《巴黎茶花女遗事》,一共翻译了欧、美、日等15个国家的文学作品180多种,字数逾千万。莎士比亚、巴尔扎克、雨果、托尔斯泰、易卜生、笛福、狄更斯、塞万提斯、兰姆等举世闻名的文学大师,因了林纾的引介而为中国人所熟悉。

林纾自言“予不审西文,其勉强厕身于译界者,恃二三君子为余口述其词,余耳受而手追之,声已笔止,日区四小时,得文字六千言,其间疵谬百出,乃蒙海内名公不鄙秽其轻率而收之,此予之大幸也。”^{[1]53}林纾不识英文,对西方小说的认识来自于魏易、王寿昌、曾宗巩等口述者。他无从选择作家,选择作品,语言隔阂某种意义上说影响了他的视野。但小仲马的《茶花女》、狄更斯的《孝女耐儿传》、塞万提斯的《唐吉珂德》、托尔斯泰的《高加索之囚》、伊索的《伊索寓言》、哈葛德的《迦因小传》等等,也都不是等闲之作,可见口述者也非等闲之辈。虽然如此,林纾语言劣势毕竟是客观存在,但一条路走多了,毕竟不会迷路。林纾说:“予尝静处一室,可经月,户外家人足音颇能辨之了了,而余目固未之接也。今我同志数君子,偶举西士之文字示余,余虽不审西文,然日闻其口译,亦能区别其文章之流派,如辨家人之足音。”^{[1]53}“不审西文”之局限,为“如辨家人之足音”所破,也就一往无前。林纾耳闻笔述,以古文笔法译介西方文学,历来见仁见智。曾朴曾对林纾提了两条意见,一是用白话翻译,一是应预定译品标准。林纾“对曾朴的第一条意见完全反对,

说他如果用白话译书是用违所长,不敢领教。至于第二条意见,林纾思考再三,怕做不到。他想自己不懂外语,无从选择预定,即使立了标准,靠别人选择也是徒劳,况且人家如今不也说是拿着名作来合译的么?再则他对自己的译笔也颇为自信,还时常流露出化腐朽为神奇的自尊心。既然如此,倒觉得曾朴的意见有些刺耳。”^{[2]213-214}“钱钟书说,他宁可读林纾的译文,不乐意读哈葛德的原文。哈葛德的原文很笨重,对话更呆板,尤其是探险小说的对话,把古代英语和近代英语杂拌在一起。林纾的译笔比哈葛德的轻快明快。”^{[2]276}口述者的讲述,林纾意会神交的,很快进入故事和人物的审美境界。可见林纾的古文已脱离“之乎者也”之巢臼,驰入“简洁明了”之美文旷野,尽得形神兼备之妙。

林纾用儒家道统解释西方文化风俗,是特定历史语境下借他山之石攻玉的文学策略。第一部译作《巴黎茶花女遗事》由“晓斋主人”王寿昌口译,“冷红月”林纾笔述,1899年初于福州刊行。林纾在批判资产阶级虚伪道德观的层面融入了父慈子孝的儒学意识,女主人公追求平等自由的爱情理念赋予自我牺牲的女德。虽然如此,玛格丽特捍卫人格尊严和蔑视权贵的人道主义光芒在林纾笔下还是破空而来。西方近代人文价值观对封建礼教的补救,可以说是“引西救儒”的隐性表达。“五四”一代人由此认识西方作品,喜欢西方文学,推崇西方文化,对“倡白话,废文言”之文学革命有潜移默化之效。曾宪辉说:“平心而论,‘林译小说’不仅对近代‘新小说’有直接影响,即使是对五四‘文学革命’在客观上也起了积极的作用。林纾不相信外国文学翻译多了古文的光焰就会熄灭。然而他翻译的大量西洋小说,正好动摇了他所维护的旧文学的根基,成为他所反对的新文学的借鉴,这是他始料不及的。”^{[2]348}胡适赞其开启小说译介之风,坦承“叙事文受了林琴南的影响。林琴南翻译小说我总看了上百部”^{[3]280}。施蛰存说“他首先把小说的文体提高,从而把小说作为知识分子读物的级别也提高了”^[4]。可谓“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译界泰斗平复慨叹“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巴黎茶花女遗事》以古文笔法译域外小说,提升了小说在中国士人心目中的地位,胡适赞其“替古文开辟一个新殖民地”绝非过誉。此时,梁启超“小

说界革命”尚未启幕,林纾捷足先登“扶正”小说地位。梁公号令“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水到渠成。“小说界革命”功归梁启超,忽视了林纾的贡献。梁启超甚至诟病林译小说“因文见道”,“于新思想无与焉”,颇类得了便宜卖乖。林纾不同于严复、梁启超、夏曾佑等新小说家,他是在“引西救儒”的理念引领下译介西方小说的,但林译小说与新文学启蒙不期而遇,使原本为沟通中西、消除偏见的文学翻译,间接成为“五四”一代选择西方文化价值的导引,既超越了他本人的审美期待与道德取值,也超越了当时文人读者的心理期待和审美想象。背负“守旧”骂名的林纾以自己的文学修为令“新派”人物不由自主地放下了身段。

1924年10月林纾去世,周作人在《语丝》第3期上撰文,说林纾“在中国文学上的功绩是不可泯没的”,林纾的百余种翻译令“我们趾高气扬而懒惰的青年,真正惭愧煞人”。“林先生不懂什么文学和主义,只是他这种忠于他的工作的精神,终是我们的师,这个我不惜承认,虽然有时也有爱真理过于爱我们的师的时候。”^[5]胡适与周作人是“五四”文学革命的急先锋,是倡导白话文的领军人物,摒弃“语言洁癖”,认可林式翻译。就连常常被“主义”遮蔽慧眼的郭沫若也不得不承认:“前几年我们在战取白话文的地位的时候,林琴南是我们当前的敌人,那时的人对于他的批评或者不免有一概抹煞的倾向,但他在历史上的地位是不能抹煞的。他在文学上的功劳,就和梁任公在文化批评上的一样,他们都是资本制革命时代的代表人物,而且相当是有些建树的人物。”^{[2]349}

在“文白之争”中败阵的林纾,没有丢盔弃甲一蹶不振,而是“日区四小时,得文字六千言”,以令人瞩目的文学修为转败为胜。

三

“维新变法”仅仅一百零三天就以失败告终,光绪帝被囚禁瀛台,康有为、梁启超流亡国外,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杀。这场希望通过自上而下的政治改良挽救民族危亡的爱国政治运动不幸夭折,但是由此引发的“引西救儒”的救亡策略成为仁人志士的不懈追求。

“西学”作为反思和批判传统文化的思想资

源,并非偶然。鸦片战争,坚船利炮撞开闭关自守之门,于是羨西方“器物”,遂有洋务运动;建了海防造了大船,甲午海战功亏一篑,于是慕西方“制度”,遂有维新革命;推翻帝制,不见国运亨通,于是尚西方“文化”。近代“引西”谋“救儒”,现代“引西”呼“废儒”,貌合而神离。但近代“引西救儒”为“五四”运动救亡救国、新民新德的精神做了文化准备是毋庸置疑的客观存在。近代严复译介赫胥黎《天演论》,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理论阐发其救亡图存的观点,表达“新民”的启蒙主张。但严复早期之“引西”,对国学一概否定,主张全盘西化。因《天演论》耳目一新的鲁迅,坚信未来一定要比过去好,青年一定要胜于老年人,振臂呼唤民众认识儒教“吃人”的本质。从严复到鲁迅,“西学”完成了从“救儒”到“废儒”的思想转型。无论“废儒”还是“救儒”,借助西学之力是一脉相承的。

林纾是严复同时代人,但与严复、梁启超、夏曾佑等倡导“新民”的新小说家不同,没有旗帜,没有口号,偏居一隅以古文笔法译介西方作品,在晚清非但没有遭遇滑铁卢,还由此抬高了小说的地位。虽然用儒家道统演绎西方文学承载的思想文化启蒙,招致非议,但随着时间推移,其特定历史语境下的文学修为,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眼光。人们渐渐移除投射在林琴南身上的“守旧”的视线,开始欣赏林纾潇洒的文言蕴含的极具个性的现代思想。林纾从非主流的边缘地带出发,本身不说明真理,但标志着排除通向真理的障碍,驱散了笼罩在传统文化之上的幻像和雾障。在林纾笔下,儒学并非一无是处,西学并非十全十美,这是林纾文学修为极具个性的审美点。以“儒学”体悟“西学”,批判传统与儒西互补贯穿林译小说。这种思想反拨通过语言隔阂和语境沟通在审美体验上目遇神交,又以浸淫最深的古文表达,批判与反批判在林纾身上反复较量,撞出了火花。

批判母体文化与推崇母体文化的论争,近代始,现代袭,当代盛。“寻根”作家韩少功《爸爸》的主人公丙崽只会说两句话,高兴了见谁都叫“爸爸”,不高兴了就骂“X妈妈”。韩少功通过丙崽的“喊爹骂娘”批判对外来文化的盲目崇拜和对母体文化的缺乏尊重。莫言《丰乳肥臀》的主人公金童从躺着吃奶到坐着吃奶到站着吃奶,除了母奶以外不吃任何别的东西,摆出一副“不

吃奶，勿宁死”的气概。莫言通过金童批判对母体文化的过度依恋和对外来文化的排斥。丙崽弱智，所以骂娘；金童变态，所以恋乳。你可以取笑丙崽，也可以耻笑金童，可是笑过之后难免会有点不好意思，因为这种弱智和变态的文学图景，我们在内心深处并不陌生。因为近现代已经路演了好多次。

林纾有深厚的母体文化情结，但这种情结没有阻隔他对外来文化的喜欢，却又使他在引进外来文化的同时选择了文言，这既非丙崽式的文化弱智，亦非金童式的文化变态，而是以成熟的文化姿态体认现代与传统的关系，巧妙地沟通“新”与“旧”之间的文化隔阂，不失文化自尊，值得敬仰。构建西学启蒙教育的严复，担任北大校长之后，反躬自省，提出治旧学，旨在“用以保持吾国四、五千载圣圣相传之纲纪彝伦道德文章于不坠”，是激情过后的理性思考，不是出尔反尔的思想倒退。林纾文言引介“西学”是近现代有激情有理性的文学修为。

参考文献：

- [1] 曾宪辉.《孝女耐儿传》序[M]//林纾诗文选.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 [2] 张俊才,薛绥之.林纾研究资料[C].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
- [3] 胡颂平.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
- [4] 施蛰存.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集[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0.
- [5] 周作人.林琴南与罗振玉[J].语丝,1924(3).
- [6] 朱寿桐.重新理解文学批评[J].新华文摘,2012(10):98-100.

朱寿桐先生说“真正理想的文学批评就是这样,包含着一定的学理和逻辑的成分,但未必需要抵达学术和真理的层次,因为它毕竟是一种富有灵性和情感的书写,毕竟是对文学作品及文学现象进行审美拥抱的结果,其中学理的运用即便需要,也需是带着情感温度和人性热度的热理性。”^{[6]100}林纾的文学修为主要是译介“西学”,引他山之石攻玉。作为研究者,不审西文,没看过西方原版作品,站在文本外围欣赏风景,很难看到林纾翻译过程经历的文化碰撞与文化沟通的美丽景色。如果看过小仲马《茶花女》原著,再看林纾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具象与具象比对,可以更好地体认林纾语言转换承载的文化思考。虽然有这样那样的遗憾,但并不影响我们走近林纾。毕竟,我们追求的不是“抵达学术和真理的层次”,而是文学审美的“情感温度和人性热度”。

岁月无语,格物致知。林纾没有辜负时代,没有辜负自己!

(责任编辑:许秀清)